

访谈录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仲威：

我想倡导古人在碑帖上的审美和价值观

本报记者 李纯一

11月1日至14日，上海图书馆、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大展”。此次唐碑大展有65件（组）碑帖善本亮相，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其中有镇馆之宝吴湖帆旧藏宋拓《四欧宝笈》，以及宋拓《虞恭公温彦博碑》清内府本、宋刻宋拓《大字麻姑山仙坛记》、宋拓《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等等，且以16个8米长的展柜，尽可能地展示这些珍稀碑帖，令观者大饱眼福。

上海图书馆藏碑帖25万件，其数量与质量国内领先。1950年代，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认定其中144件为国家一、二级文物，今天，在仲威的整理发现下，馆藏善本的数目已达3000件，其中一、二级文物近1000件，尤以宋拓唐碑、明拓汉碑和宋代法帖为特色。在此次唐碑大展之后，上图还将陆续推出汉碑和宋帖大展。

近日，本报采访了策展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仲威，请他谈谈今天的碑帖收藏与研究。

全形拓是“糖衣炮弹”，铭文才是主角

文汇报：您一直强调以文物价值来引领碑帖收藏，讲求器物本身的珍贵、看重铭文。然而今天大家对美术史的看法不一样了，可能对其他资料更感兴趣，像全形拓、碑额和图案。对考古的看法也不相同，以现代考古科学为本位，是摆脱史料、不对证经补史的。今天新的学科潮流，对碑帖收藏和研究有影响吗？

仲威：实际上我最初也不反对图案。我进图书馆第一天，看到两件东西——正好有个外国代表团来访，给他们展示的一个就是吴湖帆的《四欧宝笈》，一个是昭陵六骏的全形拓。六匹马，像床单一样大。我一看，哇！这个喜欢，栩栩如生，民国时候李月溪的拓本，相当震撼。但我们这次唐碑展，不会放这些东西。这件肯定受欢迎，但和我理念有违——这不是真东西，它是一种“拓画”，不是直接从昭陵六骏上拓下来的。宋拓本为什么珍贵？那是因为宋代和这块石头有过一次亲密接触，碑帖的珍贵离不开这个文物。

还有一点，历朝历代受限于经济条件，为了省纸，碑额、题名都不拓，碑额边上的龙首，更是不会拓。实际上对图案的推崇是从黄易发现武梁祠开始的，后来还有陈介祺藏君车画像。但这些都是有铭文的，古人还是看重上面有汉代人的字，有汉代人的信息。然而我们现在到徐州博物馆、南阳博物馆看到的那些汉画像石都是没有铭文的。当然，从美术角度来说，研究这些图像肯定是对的，它们把汉代的影像、服饰、礼节、生活状况保留了下来。

但这个和我们碑帖收藏有点不搭界。美术史研究者从宗教方面、从经济方面去考量，这都是对的。考古也是。一个汉墓做发掘，当然要考证里面的人，考证这些图案。因为现在也只有这些图案信息的。但这不是我们的本职。从传统的收藏氛围来说，图案是后起的。我的看法是，如果确证是南阳出土的汉画石，非常精美，题材也无妨，但普通人甚至某些书法家都不辨真假，就因为这些东西便宜、易得而往上题，这就造成垃圾了。我反对的是这个。这么下去的话，这二十年里会生产出一大批金石垃圾。

文汇报：古人是如何判断碑帖的上品中品下品的呢？

仲威：宋拓本唐碑，明拓本汉碑，这些永远是主流的经典。在古人这里，铭文是主角。今天的人，因为铭文内容感动不了他，他认识这个东西，就不重视。今人能够欣赏的就是视觉的美。当然我觉得全形拓是好事，但应该让它做一个“糖衣炮弹”，让人家进来，喜欢，吃一口，然后越来越深入。

我想要把我知道的古人的价值观，应该怎么鉴赏收藏，告诉大家。本末不能倒置，不能没有游戏规则。我们就应该保守一些，传统一些。就像京剧戏一样，我唱梅派就要像梅派。这个领域不是搞发明创造的。创新应该放在搞芯片上。行当不一样。

从我们馆藏的文物上，可以看到明代中后期这些碑帖成为文物、成为艺术品之后，清代到民国初期的人是怎么收藏的，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哪些东西当成宝贝。而且会看到，这些都是般配的，一流的东西都有一流的人去题跋。

本来，中国文物收藏里面，最有声望的人收藏青铜器，然后是古籍碑帖，其次才是书画瓷器各色杂件。现在我们全反过来了，玩小铜板也以为是宝，把钟鼎大器给忽视了，这是刻划无益、唐突西子了；何况近整幅拓片当成主流，还以为自己是在象牙塔的顶端。拍卖行的文物标准几乎是富商决定的，从民国开始就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原来的收藏群体消失了。现在真的有很多误区盲区，如果是这么收藏下去，只会走下坡路。

公藏机构应该大量购买新出土的墓志

文汇报：实际上，今天只有您这样的公藏机构的研究者才有机会和如此之多的碑帖善本朝夕相处，之前的收藏大家也没有这样看到全貌的机会。您觉得相较于前辈收藏和研究者，今天能做、应该做的工作是哪些？

仲威：和前辈比起来，我有“金”这方面的努力。这几年我开始关注青铜器，对铭文和全形拓都做了工作，出版《纸上金石》《纸上吉金》这些书。我尽我的最大能力，也得益于这个库房，真的很幸运。我叫人家帮我刻一方章，仿康有为所称引的“艺舟双楫”，叫“金石双楫”。

如果用四个字概括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金石书画。而这五千年文化，以石鼓文为中点。之前2500年是甲骨青铜。现在的书法家认得曹全碑、张迁碑，但前面的魏季子白盘、大孟鼎、大克鼎上

的铭文，都不认识。如果他们能辨认出上面的铭文是西周晚期还是西周早期的，那说明我们的书法教育就对了。书法史是五千年的书法史。所谓金石，我们现在还不够重视“金”，只做了一半。

我不是搞古文字的，也不是做史学的。碑帖的研究有很多面向。如果说研究里面的史料，对唐代的史料有所发现，用不上我们这批馆藏。这批最珍贵的东西，在历朝文献里早已有文本。我作为图书馆的研究人员，最大的本职工作还是揭示我们上海图书馆的文物珍贵性，为上图发现一些国宝。

文汇报：国宝级藏品已经进入公藏机构。不过您之前提到工薪阶层也可以通过正确的收藏理念，通过大量的研究，来实现善本收藏；收藏汉魏名品，讲究版本，还要注重名家题跋。今天，此类流通于市场的名品还多吗？最近几年上图有没有买过什么新的东西？

仲威：95%的好东西都在公藏单位了。碑帖为什么现在市场那么小众，价格不贵，就是因为没有重量级的东西，没有像上海博物馆馆藏安思远《淳化阁帖》这样轰动的事件。如果重量级艺术品留在民间，到今天上拍，对碑帖市场会是一剂强心针。

碑帖的复兴需要一个过程。民间的好东西能够提高大家的水平，而且这样状态下的善本，是活着的。假设一百年前，吴湖帆《四欧宝笈》早早进入公藏，就没有这么漂亮了。吴湖帆把它装帧，从26岁到50多岁，请上海文化界学术界的众多名流题跋，自己又画画，所以这个文物是活的。如果当时进藏，这件东西很单薄，不会成为中国碑帖收藏史上的标志性文物——如果碑帖只留一件，就是《四欧宝笈》。吴湖帆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不是个简简单单的继承者，这些都是他自己玩出来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行家。

所以到了今天，我不希望图书馆再买贵重文物了。公家应该去买新出土的墓志，丰富馆藏，公藏机构要继续发展，就一定要买这些新东西。但也不用每家都买，最近二十年里出土的墓志至少两万种以上，多如牛毛，收不胜收。国家图书馆买就行，然后全部数字化，各个高校各博物馆送一套。墓志类的收藏还是国家层面来完成比较好，我不主张个人藏家去买这些。

我最初做《翰墨瑰宝》，就是想要超过日本二玄社

文汇报：今天可能很难恢复过去收藏者那样的一个知识群体了，因为读书人的知识基本构成已经完全不同。您觉得关于金石碑帖的这套知识，应该如何传承？

仲威：其实我们现在研究一点不缺。古代的金石家，以翁方纲为例，是官员、学者、书法家、收藏家四种身份集于一身。今天把原来的一个人，分成了四个人。做学者的，在高校、社科院，搞历史的还在搞历史，搞石刻文献的还在搞石刻文献，只是专业分工了，他不再鉴赏了。金石研究领域一个都没缺门，只是各自独立了。

古代其实每个人也有侧重，像翁方

纲就是鉴藏派，其他一些人是学者角度，要看个人的专长。所以唯一的变化就在于没有集各种身份于一身的人了，这类人的缺席会让原来珍贵的东西缺失权威，而玉器、陶器、瓷器这些完全靠视觉欣赏的东西就获得了富豪的加持。要说传承，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从收藏开始推动，并且是以正确的观念收藏，“明明白白”地收藏，来推动碑帖的复兴。现在碑帖收藏是开始热了，但正确的收藏观念太小众了，所以我现在不能再安静了，我要通过朋友圈和各种新媒体做行为艺术，去倡导。

文汇报：今天影像与拓本印刷技术的发达，会造就一个新的收藏与研究生态吗？

仲威：我对影印本是又恨又爱。一百年前，有摄影术以后，石印本、金属板都出来了，这就把刻法帖的命运给绝掉了。原来我们去苏州园林去，都是刻帖的人，现在有照片了，谁还去刻呢？所以民国初年，法帖就灭绝了。碑也是没生命了。碑原来是为记录历史事件，打一场仗、造一幢房子、造一间学校，都要立个碑，现在这个功能没有了，我们通过各种媒体渠道，这些信息都能传递。收藏鉴别的技术也是一样。原来普通文人要考科举，就要练《九成宫》，要买一张陕西的拓片。普通文人也粗通一点碑帖版本的知识。而我们现在去买，一看版权页，如果是上海书画社、文物出版社的，就知道比较专业，买这个。所以今天的学生哪怕念文史的，这方面的鉴别功夫也不需要了。

但是出版也有好处。出版了才有这么多研究成果。像晚清方若写下《校碑随笔》，到了王壮弘的时候，有了众多石印本、珂罗版，所有的私藏公藏善本都归在一起，让他能够比对。于是王壮弘作《增补校碑随笔》，对碑帖研究作出重大推进。

如果没有技术革命，也没有我的成果。我原是非常抵触现代技术的，电脑也很晚用。2003年的时候我开始用数码相机，大量拍照片，我所有书的照片都是我一个人“三跪九叩”拍出来的，拍坏了好多相机。想想如果还在用底片，那是不得了的成本。而且现在进电脑了也好检索。所以，有了影印本以后，把版本研究推到一个新高度；到我，通过数码相机和电脑，有了现在的成果。每个阶段的人都是借助了当下的技术手段，技术的变革也让研究面目一新。

其实在我心里，始终有一种使命感。我最初做《翰墨瑰宝》，也就是碑帖印刷品的时候，就想要超过日本二玄社。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影印出来的碑帖以后，觉得八十年代自己买的胶印本都是垃圾。我想好好出版我们自己的碑帖，把我们历年新发现的东西也展示出去，于是做了这么多年。现在《翰墨瑰宝》这套书，是我的最爱。



第480期



二十多年前，为了碑帖研究的志向，仲威在孙启治（顾廷龙助手）、陈先行（顾廷龙弟子）的指导下，加入了上图碑帖珍本整理的“苦行僧”行列。

碑帖收藏者们是最理性、最好学的一批人，也是最清贫的一批人

仲威

碑帖热起来，主要归功于2003年，上海博物馆购入安思远藏《淳化阁帖》，并作展览。就是这次展览，几个月下来，把这样一个小众文化宣传出来了。朵云轩、上海古籍书店卖出了大量碑帖普品。从这时开始，民间的碑帖收藏也一点一点热起来。

现在的，在碑帖收藏领域，年轻白领介入很多。我一直纳闷，他们是哪里学的，博物馆、图书馆又没怎么搞展览。有些人水平比我还高。我的东西都写成书，我的十八般兵器他们都有，他们在暗处我在明处，他们知道的东西我不知道。但我曾有点不屑一顾，他们看过什么好东西啊？直到最近七八年，我和收藏界的朋友接触了以后，才了解到，这些年轻人的眼界是从拍卖学来的——他们像候鸟一样，哪里有拍卖就飞到哪里，从第一件看到最后一件，拍照。

现在都用手机拍。十年下来，手机里的资料越来越多，还积累了信息量，哪张东西是经常出来的，哪张是不出来的，他们也有大数据了。所以我说，碑帖的收藏者们是最理性的一批人，也是最好学、最勤奋的一批人。他们学习好以后，不需要再去找一个掌眼的，自己就能看得明白。而恰恰是这批人，也是收藏圈子里最清贫的一批人。相比收藏字画的那批，玩“黑老虎”的人学问最高，修养也比较高。

碑帖为什么叫“黑老虎”？就是因为有标准。实际上碑帖版本还是很容易入门的。假设你要买《九成宫》，花一两百块把市面上所有的《九成宫》印本买来放桌上，再去拍卖行把要买的那套照片拍下来，和它们比对。你拿着我的书或者《增补校碑随笔》把各种功课做一下，就清楚了。你买了这个东西，如果我一看有问题，指出来，你再看看也马上明白。书画则是“笑面虎”，闹腾空间很大。



“上图的善本碑帖收藏是与上海当时的历史、文化、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晚清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官商齐聚上海，资金与文物云集沪上，其中碑帖善本亦多半流通到上海。馆藏如此众多的碑帖资源绝非偶然，是旧时的碑帖藏家和碑帖商人共同孕育了这份特殊的文化遗产。”（仲威《善本碑帖过眼录》）

图为吴湖帆旧藏宋拓《四欧宝笈》中的《化度寺邕禅师塔铭》 图片来源：上海图书馆

论衡

因果识别 挑战经典理论的实证研究工具

梁捷

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中的大量问题，本质上都是需要解答因果关系。比如，个人或群体的一部分环境被改变了，他们的某项处境或者某一类个人行为是否会发生变化？现实中，我们只可能观察到某个特定主题的某个潜在结果，而我们又必须对这个潜在结果进行比较，得到可靠的因果关系，这其中就有一些技术要求。

一些学者认为，在最近二十年里，经济学界已经掀起一阵“因果识别革命”。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卡德（David Card）、麻省理工学院学院的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因本斯（Guido W. Imbens）正是解决了因果识别中涉及的大量技术性难题，还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劳动、教育、移民、医疗保险、社会政策等诸多领域。他们的研究对很多经典经济学命题构成了挑战，本文就从中选择较有代表性的三个命题——最低工资问题、移民问题和教育问题，加以介绍。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有关最低工资的法律总是对工人不利，因为它剥夺了工人以较低工资水平工作的机会。而且，最低工资的上涨会导致雇主在成本压力下裁员，尤其会裁减缺乏技能的工人，如青少年、高中未毕业生以及从事低端服务业的工人。尽管这些观点一直在经济学课堂上传播，但也一直缺乏经验性证据。很多国家都设有“最低工资法”，而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的合理水平、最低工资对于就业率的影响则缺乏一致性看法。因为，其中存在复杂的内生性问题，人们难以分清到底是最低工资影响就业率还是就业率影响了最低工资。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全国的最

低工资一直很稳定。但1992年4月1日，新泽西州的最低工资从每小时4.25美元提高到了5.05美元。与它毗邻的宾夕法尼亚州并没有调整，还是每小时4.25美元。卡德与合作者利用这次机会，调查了两州410家快餐店在最低工资调整前后的雇佣情况，尝试通过这次偶然的自然实验来研究最低工资对就业率的影响。

研究就业率的时候，我们往往很难判断就业率的变化是由最低工资变化导致，还是由于区域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卡德等采用了当时还很新颖的“双重差分法”，正好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宾州与新州地理相近，经济发展水平也很接近，所以两州快餐店受区域经济的影响也必定相似。在这次自然实验中，宾州没有受到最低工资变动的影响，所以它可以作为基准的时间趋势。在新州的就业率变动水平中减去宾州的变动趋势，就可得到最低工资对于就业率所产生的纯粹效应。

卡德等1994年发表的论文指出，两州快餐工人的就业情况并没有显著差异。那些原本雇佣很多最低工资员工的快餐店，并没有因为成本上升而减少雇佣人数，而是和那些工资较高的快餐店一样，反而雇佣了更多工人。最低工资的提高，提升了员工的福祉和消费水平，也有可能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需求。卡德等的研究，证明最低工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就业率下降，其中的作用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一个地区涌入大量的外来移民，劳动供给大量增加，必然会降低这个地区的工资，同时导致本地居民面临更严重的就业困难，失业率大幅度提高；而且，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远不能与其他市场相

比，所以要谨慎对待大规模移民——这是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看法。但在现实中，移民研究非常困难。因为移民一般是持续而缓慢的，而且很少简单地从一地移动到另一地，使得研究者不易搞清移民的来源地。此外，不同时期移民的目的也不同，目标城市的就业率原本就是移民在行动前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而卡德又非常巧妙地找到了一个自然实验，可以纯粹地研究大量移民对移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1980年，古巴领导人宣布，允许一切想要离开古巴的人从马列尔港离开。短短几个月内，有十几万古巴人由此进入美国迈阿密。这完全是个意外事件。在此之前，美国人和古巴人都想不到这一点。而离开古巴的这个机会，在几个月后也宣告终止。

迈阿密这个城市被古巴移民选中，并不是古巴人觉得这里就业机会特别多，或文化与古巴接近。单纯只是因为这里距离古巴最近。且事发突然，迈阿密本地企业和工人在短时期内都没来得及对此做出反应。所以可以清晰地认定，外来移民的冲击是因，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变动是果，通过这次事件研究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力

市场的冲击，因果关系不存在争议。卡德统计了移民到达前后迈阿密原本居民工资和就业率的变化，同时再与美国其他4个与迈阿密“相似”的城市——亚特兰大、休斯敦、洛杉矶和坦帕居民的变化进行对比。卡德发现，无论是在移民到达后不久，还是几年以后，迈阿密与其他几个城市的对比变动都没有什么不同，古巴人的到来并没有影响当地人的工资水平。卡德还特地比较了在“马列尔港事件”之前来到美国古巴移民的工资。他们和刚来的古巴移民很相似，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明显差异。

这是一次绝妙的自然实验设计。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外来移民冲击并不会影响本地居民的工资水平和就业率。移民在短期内确实增加了劳动供给，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劳动需求，让本地企业和居民可以面向更大的市场。即使考虑长期影响，来自较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市场也无不利之处。移民会自然分成不同层次，参与到各个收入水平的就业岗位。一个城市并不会因为太多的外来移民而堕落，移民反而会令城市文化更为多元。

教育领域亦是卡德、安格里斯特等学者大显身手的领域。安格里斯特与合作者在199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中极为巧妙地引入了一个工具变量，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明确了其中的因果关系，被学界公认为典范之作。

教育的长期回报率是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人都会关心的问题。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时间长短，对于未来的终身收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政府是不是有必要调整《义务教育法》中的教育年限，用法律手段强行提高全国人民接受基础教育的时长？这个问题很重要，又很复杂，仍然是因为它其中存在内生性。一个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拿着什么样的工资，这固然都是自己的选择；而一个人接受多少年的教育，可能也是自己的选择。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又纠缠在一起。

安格里斯特发现，美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当年年满6岁的儿童，都需在当年9月入学。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生日如果是12月31日，那么他和生日是1月1日的孩子一样，都要在当年9月入学。所以平均来看，第一季度出生的孩子在入学时平均年龄6.45岁；而第四季度出生的孩子入学时平均年龄只有6.07岁。同时，美国《义务教育法》还规定，只有年满16岁的青少年才可离校，辍学去工作。假如一个人的生日是1月1日，在他16岁的那一年，过了1月1日，他就可以辍学去工作；而如果他的生日是12月31日，那么他就要多上一整年的学，到第二年才能合法地离开学校。安格里斯特特检查了美国的劳动数据，在1940年代以前出生的美国人，确实有一部分到了合法的辍学年龄，就选择去上班了。

于是，安格里斯特与合作者使用每个人出生的季度作为工具变量，分析了美国

人接受教育时间与后来收入回报之间的关系。每个人出生的季度完全外生，不能由自己选择。在回归分析中引入这个工具变量，那么教育年限为因，教育回报率为果，因果关系就得以明确。

他们的研究发现，对于192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第一季度出生的人比其他三个季度出生的人少上了0.126年学，教育回报率也要低0.7个百分点；对于194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第一季度出生的人比其他三个季度出生的人少上了0.109年学，教育回报率要低1.02个百分点。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美国人接受的教育年限越少，教育回报率就越低；接受教育越多，教育回报率也会越高。

基础教育对于个人的长期收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个结论对于政策制定富有重要意义。当然，我们面对的世界不会像理论世界那样完美。自然实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实证研究者面对不完美的研究数据时，不得不对它们进行一系列必要的技术处理和分析，确保因果分析的有效性。因本斯就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理论工作，安格里斯特与卡德又做了大量实践应用，共同掀起这场“因果识别革命”。到了今天，因果识别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实证研究工具，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熟练应用自然实验法、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断点回归法等方法进行因果分析。过去很多命题只能通过理论模型推演，而今天则可借助因果识别来进行更贴近现实的分析。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证研究工具不仅验证了大量经典理论，也在不断地挑战经典理论，给理论经济学家提出更多的难题，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义所在了。（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